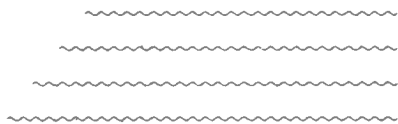


瓜分中国梦想的破灭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6月，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军大举进犯我国，侵占我国天津、北京、直隶、山西等地，以及沙俄霸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一次大规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遭到了我国人民自发的群众武装——义和团的殊死抵抗，清政府的部分主战派将领也率兵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既惧怕帝国主义的入侵，更仇视义和团运动，因此对八国联军的入侵，是战，还是和，始则举棋不定，首鼠两端，当战火危及京都特别是她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慈禧才被迫“宣战”，但仍旧意在利用义和团抵御洋人，借洋人

之手扑灭义和团运动，其间清军并未全面投入战斗，因而战争的准备并不充分，战役和战斗并没有大规模地展开，于是八国联军得以长驱直入。联军攻陷京都时，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逃往西安，命主和派的奕劻和李鸿章留守京都为全权大臣乞和，最后清政府全盘接受帝国主义的苛刻条件，于 1901 年 9 月 7 日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使我国蒙受了巨大损失。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分驻京、津等地外，其余撤兵回国。

一 联军侵华背景

八国联军侵华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9 世纪中叶的世界格局是，一方面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致使他们不断向外扩张势力，另一方面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使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有隙可乘。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帝国主义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56 年至 1860 年又爆发了英法联军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其间俄、美帝国主义也积极参与英法联军侵华。1858 年清政府在第一次大沽口战役中失利，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 年英法联军进占天津，侵入北京，劫掠无数珍宝，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至热河，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再次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丧权辱国，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张了在中国的势力。

帝国主义列强贪婪的侵华胃口越来越大，1884—1885 年又

爆发了法国侵华的中法战争。1883 年法帝国主义在侵入越南之后，紧接着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挑起战火。战争初期清军连连失利，1884 年 5 月清政府与法国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8 月法军舰队进攻台湾。1885 年法军又进犯广西边境，清朝爱国将领冯子材在镇南关和谅山大败法军，刘永福也在临洮重创法军，引起法国政局动荡。但腐败的清政府还是授意主和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条约》。1884 年又爆发了中日甲午海战，该年 7 月日本趁朝鲜东学党起义，出兵侵占朝鲜，尔后向中国海军发起突然袭击，8 月 1 日正式宣战，9 月中国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中受挫，10 月日军入侵东北，11 月攻占大连、旅顺等地，1885 年 2 月攻占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尽管北洋舰队官兵在海战中英勇作战，视死如归，但由于清廷的腐败和战舰、武器装备的落后，导致最终惨败，李鸿章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再次得逞。一次又一次帝国主义侵华，一次又一次签订屈辱和约，为八国联军侵华准备了条件，终于在 1900 年爆发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

提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不能不从战争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谈起。义和团是参战一方重要的军事力量。义和团本名义和拳，原是清朝民间的群众组织“私会”，称之为“义和”，源出于白莲教和八卦教，是离卦教的一个支流。据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说，因“其教以练习拳棒为由，托言神灵附体，讲道教拳，詭称念诵咒语能御枪炮”所以称之为“义和拳”由此也可知它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该教名最早见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的“上谕”中，它与当时的民间组织“顺刀会”、“虎尾鞭”等会党活动于江南颍川、亳州、徐州和江北河南、山

东一带。义和拳曾参加过八卦教首领李文成领导的反清起义，奉行“反清复明”的宗旨。

鸦片战争之后，义和拳一直活动在山东、河南、江苏一带，参加者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船户和其他民众。从 1896 年起，德州一带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和另一群众组织“大刀会”都参加过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但受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1898 年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将义和拳编入乡团之列，于是始有“义和团”之称。1899 年义和拳正式更名为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义和团由山东、河南扩大到了整个直隶，津、京两地声势尤为浩大。清政府极端仇视义和团，斥之为“邪教”意欲加以取缔，而义和团则针锋相对地在告示中申明大义：“义和团，义者仁也，和者礼也，仁礼和睦乡党，道德为本，务农为业，而遵依佛教。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

义和团以村、镇为单位组织，也有大的按县为单位组成，以设拳坛、拳厂、练拳术等方式组织群众，拳民对拳艺十分讲究，研习演练，互有师承。其基层组织为“坛”或“团”，每 25 人为一团，据《拳事杂记》载：“每传拳法一处，必须招集二十五人，是为一团，每团立团首，一团人之聚散，皆从其令。”也有 100 多人为一团的，合并各团仍称为团，少者千百人，多者上万人。其最高的组织按《周易》八卦，分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大团。各团都有教师，称“大师兄”，大师兄均由山东而来，隐名埋姓，行踪也较为诡秘。许多坛厂共同拥戴的首领称为“老师”，打仗时他们负责率领团众。每当临敌之时，则安排许多骨干分担各种职务，并建立旗帜和簿册，首领执黄旗，簿册以红布为之，上记首领及团员姓名、职务，一团之内

计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陈及分编哨队等名目。拳民入团后，彼此称“师兄”，地位一律平等。义和团主要为男性，当义和团发展到高峰时，也有女性参加，其名为红灯照、青灯照、黑灯照等。

正宗的义和团有严密的纪律，入团时需申授戒条：“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可见义和团以团结百姓，抵御洋人，反对贪官污吏为其宗旨。义和团团众平时生活十分艰苦，衣食全由自给，每日除演习拳棒而外，三餐为老米咸菜饭，夜里则席地而卧。由于他们本身是贫苦民众，纪律严明，所以很受老百姓欢迎，不少百姓送子入团，因而发展迅猛，声势浩大。而后由清廷组织的所谓“奉旨”义和团与此有所不同。

义和团从其源流和性质来看，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迷信色彩。团众在演练之余，还需画符诵咒，请神附体，传称一百零八天而成，即可刀枪不入，这又不能不说表现出一种愚昧性。限于条件，义和团缺乏军事装备，也不可能重视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练，只能说是半群众团体半军事组织。他们单兵作战血气方刚，无所畏惧，但不过是大刀、长矛而已，杀伤力不大；整体作战，虽能相互支援，但缺乏战略部署，几乎全无兵种配合，因而应战能力很差。

义和团主要的斗争目标是帝国主义列强，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屡战屡败，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百姓，又受到洋人的残暴欺凌和杀戮，真可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但是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不畏强暴的民族，面对如此社会现实，他们自然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洋人。北京的义和团曾揭帖说：“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

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天津的义和团则揭帖说：“兵法易 助学拳 要 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即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义和团这种仇视洋人的行动，虽然不无盲目排外的情绪，但从根本上来说，无疑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显示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义和团虽然公开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但或明或暗地延续着反清的传统。当时义和团中就流传着各种传说，有一种传说宣称，“西北出了真天子”即“真龙天子”，清廷应该让位于“真龙天子”；还有传说称，慈禧扶乩，问大清是否江山万年，乩语写道：“可笑胡儿不害羞，何人保你万万秋，但等莲花遍地开，五羊赶你出幽州。”由此可以看出，“扶清”只是他们抵抗洋人暂时的手段，而“反清”和“灭洋”则是他们战略方针和最终目的。因而，自义和团诞生之日起，清廷一直视之为“邪教”或“拳匪”，不时加以镇压。直到八国联军威逼北京，传言令慈禧“归政”之际，慈禧才于6月20日下令“招集义民成团，籍御外侮”，才予以正式承认，并成立由清廷组织和发给粮饷的“奉旨”义和团。于是义和团成为清军的辅助军队——团练。

6月21日慈禧对敌“宣战”之后，任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步兵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为会办大臣。清廷称义和团自己的首领为团总或团首，受清廷大臣的统领、指挥。但由于在战争中清廷缺乏远见和决心，往往临战指挥不力，义和团一般仍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有“奉旨”义和团直接受清廷的操纵和指挥。

二 天津教案前后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是所谓“教案”，即洋教士在中国占领土地，修建教堂，发展教民，借此欺压和奴化中国人民，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他们烧毁教堂，杀死洋教士，掀起了以义和团为中坚力量的反抗洋教士的斗争。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欧美传教士也乘机涌入中国。中国传统宗教为儒、道两教，东汉时又有佛教自印度传入，于是形成儒、道、佛相对立又相融合的局面达 1000 多年。洋教士所传为基督教天主教一派和新教一派，中国的旧教虽然长期麻痹着中国民众，但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欺骗性，至清朝已显现出了它的软弱无力。而基督教的一套教义不但给尚处于愚昧状态的人们以新鲜感，而且由于它是洋人所传就更具诱惑力，所以洋教士在中国得以找到市场并迅速活跃起来。至 19 世纪末，到中国的洋教士已达 3000 多人，发展教徒 80 多万，仅在山东、直隶、河南、山西等地教堂就达 4000 多处。

由于传教士随着洋人的坚船利舰和洋枪洋炮而来，所以传教士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清廷的《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就规定，传教士的主教品位与中国省级官员督抚相同，更换主教或节庆之日，中国地方官员应前往致贺，这就使得他们横行霸道，飞扬跋扈合法化。传教士除向教民传教而外，更多的活动是强行霸占中国领土和房屋，欺凌乃至虐杀中国百姓，怂恿包庇教民为非作歹。洋教士的罪恶行径引起大大小小的教案，至 1899 年已发生与天主教会的冲突 600 多起，与新教的冲突 100 多起。

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规模最大，影响深远。1860年英法联军强迫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法国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激起民愤。1870年因教会的育婴堂虐死儿童数十名，6月21日天津人民聚众到育婴堂说理，法国领事丰大业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公然开枪恫吓，击伤天津知县刘杰随从一人，群众怒不可遏，一拥而上将丰大业打死，焚烧了法、英、美教堂及法国领事馆。事后，法国联合英、俄、德、美、比、西六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集结各国军舰于大沽口向中国示威。软弱无能的清廷立即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此案，结果将刘杰革职充军，处死爱国群众20人，流放25人，赔款49.7万两白银，并派崇厚去法国赔罪，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脚下。

天津教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列强及教会势力更加嚣张，中国人民的反教会斗争也愈加高涨，各地教案此起彼伏，甚至发展为有组织的武装斗争，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便是重要标志。德国教会在山东曹州一带唆使教徒欺压民众，引起公愤。11月1日巨野县大刀会和农民在张家庄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其他各县人民纷纷响应，与教会展开斗争。德国借口教案派军舰侵占觊觎已久的胶州湾，清廷被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不仅占据了胶州湾，而且享有在山东修筑铁路和开采矿产的特权。同时，山东巡抚李秉衡被革职，并处死了两名所谓“罪犯”，判刑多人，还赔款为德国建教堂三处。

清廷的腐败、屈辱使中华民族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也使帝国主义列强意识到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在即。以义和团为主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1898年1月，德国军队侵占胶州湾，当地群

众就曾持菜刀、长矛冲入德军营房，杀伤不少侵略军。7月英军强占威海卫后，朱红灯领导的义和团和刘士瑞领导的大刀会以及红拳会等武装都与英国侵略军进行过顽强的斗争。但是，1899年12月调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却对义和团、大刀会大加伐挞，残酷地屠杀了许多当地的群众武装首领。

1900年春天，义和团中传言在北京温泉山煤洞中发掘出了一方石碑，碑文为明朝预言家刘伯温所撰：“庚子之春，日照重阴，君非桀纣，奈佐非人。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上行下效兮，民冤不伸。中原忍绝兮，羽翼洋人。趋炎附势兮，肆虐同群。逢天曹怒兮，假手良民。红灯夜照兮，民不迷津。义和明教兮，不约同心。金鼠漂洋孽，时逢本命辰。待到重九日，剪草又除根。”显然，这子虚乌有之事是民众所为，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众反抗清廷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共同心态，预示着清廷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肆虐气数已尽，到九九重阳节就把它们连根铲除了。

以义和团为主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危及帝国主义的侵华利益。此时，遍布京津和直隶的义和团声势浩大无比，他们挑铁路，砍电线，驱逐传教士，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灭洋”运动。至1900年6月北京已有义和团坛口1000多个，达十几万人。年初，英国公使伙同德、法、意四国联名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发信，威胁清政府必须镇压义和团。这时清廷内部对义和团态度不一，出现了主剿和主抚两派，总理衙门大臣荣禄、奕劻和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等主剿，以维护洋人利益，而端郡王载漪和吏部尚书刚毅等则主抚，以利用义和团达到维护顽固势力统治的目的。

3月底，美、英、德、意四国的军舰开到大沽口进行示威，

4 月英、法、俄等国的军舰又在大沽口进行第二次示威。5 月 30 日驻北京各国公使举行集会，选出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组团照会清政府，提出派兵保护使馆的要求。当天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廷总理衙门答应“各国公使调兵来京保护使馆，但调来的人数必须以一八九八年的数目为限，同时一到和平恢复，外军就必须撤退。”同时电告直隶总督裕禄：“洋兵护馆，准由火车运送，但人数不得过多，致碍邦交。”

5 月 31 日下午，各国海军纷纷登陆，加上各国在天津的军队，由天津乘专车向北京进发。据当时铁路局检查各国军队上车时的具体数目为：“英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美兵官七员，兵五十六名；意兵官三员，兵三十九名；日本兵官二员，兵二十四名；法国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俄国兵官四员，兵七十一名；共计各国兵官二十二员，兵三百三十四名。”6 月 2 日，德军 50 名，奥地利军 30 名也随即开赴北京。这是八国联军侵华共同向中国派兵的初始，但此时八国联军尚未正式组成，不过是驻京各国公使共同发起的调拨各国在津、沽水兵的临时行动。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开始陆续由本国调动大批舰船和士兵开赴中国海域，做好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至 6 月 2 日在大沽口外的各国舰船已达 24 艘，其中沙俄 9 艘，英、德、日各 3 艘，美、法、意各 2 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在即。

三 联军攻占大沽口

1900 年 6 月 4 日在法国公使的抗议下，各国公使共同议定：各国公使立即通电本国，要求下令给各国海军统帅，立刻采取应急军事措施。尔后几日内，大沽口各国军队又陆续登陆。

6月9日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给驻大沽口的海军司令西摩尔发电，让他立即派遣军队增援先期到达北京的先头部队。西摩尔当天由大沽口乘船沿海河抵达天津，并立即召集各国驻津领事和海军司令策划入侵北京。此时在天津租界地的各国军队，计英兵 915 人，德兵 415 人，俄兵 315 人，法兵 158 人，美兵 112 人，日兵 52 人，意兵 49 人，奥兵 29 人，共计 2064 人。共推英海军司令西摩尔为统帅，美国麦卡加拉上校为副统帅，这便是八国联军的最初组成。尔后，联军各国统领曾多次召集会议和组织联合行动，但此时的联军尚不是由各国政府建立起来的统一指挥的联合部队。直到 9 月 27 日，德国陆军统帅瓦德西被任命为联军司令时，八国联军才算正式组成。

6月10日清晨，八国联军 2300 多人在西摩尔的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发。这一行动激起了津、京义和团乃至部分驻守清军的怒火，他们在京津铁路沿途扒铁轨，搬枕木，奋力阻止联军北上，在北京的清军董福祥的甘军也控制了北京火车站，准备阻击联军。由于京津铁路部分被毁，西摩尔乘坐的第一列火车只得边修路边前进，至 6 月 12 日才抵达廊坊。到廊坊后立即遭到义和团的攻击。义和团战士头扎红巾，手持大刀、长矛，奋不顾身地向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联军杀去，联军只得龟缩在火车站内。这时联军的后续部队赶到，用大炮轰击义和团，无所畏惧的义和团战士有 80 多人倒在血泊中，但他们前仆后继，越战越勇，周围的村民也赶来支援，把联军死死围在火车站内。

6月16日西摩尔率部分联军，在炮火的掩护下修复铁路，乘火车逃出廊坊，退至杨村。6月18日董福祥率甘军从北京来援，义和团和甘军共 5000 余人与困守廊坊的联军展开激战。联

军虽然只有 1000 余人，但所用是杀伤力极强的洋枪洋炮，而义和团战士手中的不过是大刀、长矛。义和团和甘军几乎是用血肉之躯与联军拼搏，虽杀死联军 6 人，杀伤 48 人，但也有四五百战士捐躯。当晚，该部联军退至落堡，19 日退至杨村与西摩尔军会合，义和团与甘军又包围了杨村。20 日联军丢弃火车 突围至北运河，抢夺民船运送辎重和伤员，部队则沿北运河逃往天津。21 日天津守军聂士成率步兵、马兵沿北运河与义和团共同狙击联军，使联军受到重创，22 日联军狼狈逃至北仓。

但在少数教民的指引下，联军乘虚攻下天津西沽武库。西沽武库为天津军储重地，联军占领武库使其得到军火补给得以据守，义和团与清军包围了武库，两军成僵持状态。6 月 25 日俄国希林斯基上校率 2000 名俄军增援西沽武库联军，6 月 26 日联军烧毁武库，逃回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与租界地联军会合。此次西摩尔率联军北上一战宣告失败。据《八国联军志》记载，此役联军死 62 人，伤 312 人，义和团和爱国清军则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其意义重大，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志。连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义和团所用的武器是近代枪炮的话，那么我率领的联军必定会全军覆没。”

当西摩尔率联军北上受挫时，驻守在大沽口的各国舰队感到形势不妙，于是也紧急行动起来以牵制义和团与爱国清军。大沽口是京津和直隶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此时的大沽口炮台由三座土垒构成，南岸设炮台五座，北岸设炮台两座，背后设炮台一座，共有清军步队、炮队二三千人驻守，除旧式武器而外，又增添了外国所产新式大口径火炮，大沽口海面还有新从国外购进的 3000 吨位的“海容”号巡洋舰和“海华”、“海

龙”“海犀”“海青”四艘鱼雷艇。镇守炮台的清军将领是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罗荣光这时刚被提升为新疆喀什噶尔提督，未及赴任，便被派往天津守大沽口。

清廷迫于压力，6月13日令直隶总督裕禄将守护津芦铁路的聂士成军调回天津驻扎，16日在天津军粮城布置防守。此时罗荣光也在大沽口海域安置水雷，聂、罗二军都准备与敌决一死战。清廷虽然下令清军做了些军事准备，但从总体上看，并没有打一场大战的精神准备，所以往往举棋不定，行动迟缓。清军在大沽口作好陆、海军准备之时，八国联军在大沽口已集结30多艘军舰、几十只运兵船和救护艇等，船载各国侵略军数千人，两军对垒，战争一触即发。6月15日联军在俄国舰艇上召开了各国海军将领会议，密谋进攻大沽口的战略部署。会后，俄军200多人偷袭了炮台后方的重要据点军粮城，日军300多人登陆占领了临近大沽口的塘沽车站。

16日联军召集第二次会议，进一步部署进攻大沽口方案，当日又派900多名联军迂回登陆，潜伏在炮台后侧，海面上的30多艘军舰也部署完毕。一切就绪之后，当日夜里10点联军向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守军于6月17日凌晨交出大沽口炮台，以供联军代剿义和团之用，如届时不交出炮台，即开火轰击。最后通牒由俄国中尉巴赫麦季耶夫和英国领海员约翰森交给罗荣光，罗荣光当即严词拒绝，传令各炮台，马上做好战斗准备。显然，联军这个最后通牒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但就连这一形式联军也没有遵守，当夜11点，各国停泊在大沽口近海的十多艘军舰一齐向炮台开炮，用电灯照射炮台瞄准轰击，迂回至炮台后侧的联军听到炮声也立即向炮台开火，于是大沽口海战爆发。

联军炮声一响，罗荣光立即命令南岸各炮台清军瞄准电灯亮处开炮还击，双方炮火如电闪雷鸣，照彻夜空。不多时守军便将一敌舰电灯击毁，敌舰体受创转轮逃避。同时，守军副将韩照琦也在另一炮台率守军猛烈还击敌舰。在此战中，英军的“亚尔舍林”号，俄军的“海龙”号、“朝鲜人”号、“基立亚克”号战舰均被击伤。罗荣光在下达还击命令的同时，派专差向北洋海军统领叶祖珪请求下令给各海军军官协同作战，以夹击来犯之敌。但叶祖珪由于未接到清廷作战命令，而未能协同作战，致使大沽口炮台罗荣光一部孤军奋战，腹背受敌。

17 日清晨 5 时北炮台终于失守，而后联军又集中火力攻击南炮台，这时一发炮弹击中炮台后面的弹药库，刹那间火光冲天，清军牺牲众多，同时也失去了弹药补给，至 6 时 30 分南炮台失守。

在 16 日夜至 17 日晨这 7 个多小时的战斗中，据统计，登陆联军被打死 136 名，军舰上的联军被打死打伤 119 名，占进攻联军的近三分之一，击伤敌舰 6 艘，重创其中 4 艘。而清军损失则更为惨重，死伤官兵 1000 多人，正副统帅罗荣光和韩照琦以及不少军官均不同程度负伤；不仅炮台失守，而且“海容”号巡洋舰和四艘鱼雷艇被俘。

此次海战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联军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进攻力量凶猛，炮舰和武器都比较先进。二、清军大沽口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仍较落后，而且缺少外援，致使陷入孤军作战。三、清廷无进行整体作战的准备，防御松弛，致使敌舰得以开入海口并登陆至炮台后侧，为夹击炮台提供了条件。四、夜间作战，敌舰以探照灯照射炮台，而清军则难以看清敌舰，极为不利。五、弹药库缺乏掩蔽和保护措施，致使弹药库

中弹起火，丧失战斗力。

四 天津保卫战

联军攻占大沽口后，大肆进行烧杀抢掠，他们把无辜平民驱赶到一起，用火炮、排枪轰击，烧毁居民住宅，大沽口一带一片废墟。大沽口失守后，罗荣光带伤退至天津，当看到镇守无望，在天津陷落之前，他悲愤地服毒殉国。

登陆联军的第二个目标便是集中兵力进攻天津。天津距大沽口 100 多里，战略地位更为重要，占据天津即可保住大沽口，而且由此可以直接威胁清政府首府北京。

当时登陆联军的总兵力为：德国军官 44 人，士兵 1300 人；英国军官 184 人，士兵 1700 人；日本军官 119 人，士兵 3709 人；俄国军官 117 人，士兵 5817 人；法国军官 17 人，士兵 387 人；美国军官 20 人，士兵 329 人；意大利军官 7 人，士兵 113 人；奥地利军官 12 人，士兵 127 人。总计军官 520 人，士兵 13500 人。携带野战炮 53 门，机关枪 36 挺。另外，除登陆联军，在天津租界地已有 2400 多名各国军队盘踞。此时天津守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有 7000 人左右，另有直隶练军四营，义和团有团众 3 万人，森严壁垒，天津一战迫在眉睫。

在如此危急关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载漪向慈禧密奏各国公使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其他三条姑且不论，第四条让慈禧交出大权，这无异于要慈禧的命。慈禧立即震怒，狂呼“是可忍，孰不可忍！”6月16日至19日，慈禧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商讨对

策。其间主战派与主和派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辩论。载漪、载勋、刚毅、载澜等主战，用义和团抗击联军，以维护慈禧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光绪帝则主和，由于大权旁落，他幻想着通过八国联军削弱慈禧的势力，依靠八国联军重掌政权。众大臣中徐用仪、袁昶、王文韶、许景澄等人也主和，他们怯弱地说：“一国如何敌得过八国？”但光绪帝等人如何左右了时局？16日慈禧命载勋、刚毅为义和团总统大臣，载澜、英年辅佐。

6月18日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载漪提出“请攻使馆”吏部左侍郎许景澄极力反对，总理衙门大臣联元也表示反对。慈禧则怒斥“许景澄无礼”依仗权势强行通过了围攻使馆的决策。直隶总督裕禄则沉默不语，他考虑到国际惯例不可围攻使馆，但又慑于慈禧，所以尔后对各国使馆采取了明攻暗保之策。6月19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载漪命所部神虎营士兵在路上将其击毙，20日又令董福祥的甘军围攻各国公使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由于裕禄对慈禧的阳奉阴违，以及后来慈禧的“转战为和”，所以各国使馆并未受多大的损失，至7月初各国使馆军队死伤不过几十人，其他各国公使并未受到伤害，但手持大刀、长矛、木棍、石块的义和团却损失惨重。

天津保卫战从6月17日大沽口失陷，联军逼近天津即已开始。6月中旬静海县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乾字团2000多人先于张德成进入天津参加保卫战，天津的和来自静海、盐山、庆云等地的义和团都愿接受他的领导。6月18日曹福田率义和团与部分守城清军进攻俄军驻守的老龙头火车站。在义和团的猛攻之下，俄军抵挡不住，挂出了白旗，义和团攻势愈猛，打死打伤俄军500余名。

慈禧“宣战”之后，天津形势更趋紧张，联军数千人从大

沽口向天津进发，但在塘沽即遭到义和团的拦截、阻击，直到6月23日才窜入天津，途中已被击毙200多人。天津保卫战在几个战场上展开。6月23日，俄、日联军600多人从紫竹林租界地和军粮城包抄东局子。东局子即天津机械局东局，是清朝在华北最大的兵工厂，有清军坚守，但也是联军重点进攻的目标。当时聂士成部转至此据守，先期到达的文安县王德成率领的义和团也协同作战保卫，联军虽然多次发起强攻，但均被击退。6月27日联军2800多人三面围攻东局子，先用大炮轰击，后又以马队冲锋，清军则在外围敷设地雷拒敌，炸死联军甚多，战斗异常激烈。清武卫前军营官潘金山在右腿被敌人子弹打穿的情况下，仍拼命死守，指挥若定。不料中午时分，联军一发炮弹击中厂内火药库，顿时一片火海，守军只得点燃全厂，冲出重围。联军虽然攻下了东局子，但一无所获，而且被打死上百人。

6月28日张德成率静海县独流镇义和团“天下第一团”5000人来津增援。6月29日马玉崑率清武卫左军，宋庆率清海关守军继而来援。其时曹福田、张德成正率义和团再次进攻老龙头火车站，双方展开激战，义和团手持大刀长矛冲锋，联军则以洋枪洋炮还击，一批又一批的义和团战士倒在血泊之中，但仍无法占领火车站。7月3日马玉崑的武卫左军配合义和团第三次进攻火车站，清军的武器装备优于义和团，已有一些来福枪。清军与义和团包抄俄军，打死俄军100多人，终于收复了火车站。但经过几次拉锯战，俄军再次占领火车站，直至天津失陷，这里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止。

天津保卫战除东局子、火车站激战外，在紫竹林租界地也激烈地展开。天津租界地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津